

导 论

一 藏彝走廊北部地区地理概念界定

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从民族研究的宏观视野和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高度,首次提出了藏彝走廊的概念。这既是一个地理概念,同时又是一个具有深刻学术意义的概念。有学者认为,藏彝走廊是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学科进行科学研究的理想之地,是产生思想、著述立说的源地。^①费孝通先生将中华民族所在的地域大体分为六大板块、三大走廊这样一个格局,板块是指北部的草原地区、东北高山森林区、青藏高原、云贵高原、沿海地区和中原地区;走廊是指西北民族走廊、藏彝走廊以及岭南走廊。^②板块与走廊之间、板块与板块之间、走廊与走廊之间相互联结,形成中华民族聚居地区的

^① 石硕、梁枢:《藏彝走廊:思想的源地》,《光明日报》2003年12月4日,第一版。

^② 费孝通著:《从事社会学五十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91页;费孝通:《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

整体格局。而这些联结的地方，特别是在走廊与走廊之间联结的地方一般都形成一些天然的通道，是民族迁徙，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诸如西北民族走廊和藏彝走廊是古代中国西北民族与西南民族之间往来的重要通道，而本书所谓的藏彝走廊北部地区正好处在联结这两个走廊的特殊位置。无论在自然地貌以及文化生态方面均呈现出多样性的特色。

顾名思义，藏彝走廊北部地区地处藏彝走廊北段，行政区划上具体指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两地在地质上属于同一单元——青藏高原向成都平原过渡带上，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并由西北逐步向东南倾斜。藏彝走廊北部地区的地貌形态大致可分为三类：西北部属高原区，海拔一般在3500米以上；东北部为高山峡谷区，海拔在3000米左右；东南部是丘陵低山区，海拔大都低于3000米。青藏高原向东偏北方向的延伸部分即为藏彝走廊北部地区，在地形构造上也与整个青藏高原的地貌结构非常相似，亦即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因此藏彝走廊北部地区与青藏高原在地形构造上同属一个地理单元。而该区东北部与黄土高原相接，东南部则与四川盆地接壤。就我国地形构造的阶梯状地势而言，藏彝走廊北部地区正好处在第一阶梯向第二阶梯的过渡区。

在藏族传统地理单元中，藏彝走廊北部地区属于安多藏区。严格来说安多藏区其实是方言区，也就是操藏语安多方言的地区。《安多政教史》的作者、拉卜楞寺高僧、二世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对“安多”二字的语义及安多藏区的具体地望有详细阐释：“自通天河之色吾河谷（se bovi lung ring），北逾巴颜喀拉山（ba yan ha ra），其东麓有阿卿冈嘉雪山（a chen gangs

tgyl) 与多拉山 (mdo la), 据说由于摘取这两座山峰之名的首字, 合并起来把自此以下的区域称为‘安多’。”^①《安多政教史》的作者把藏传佛教在安多地区传播发展情况划分为不同河流域进行阐述, 这些流域包括: 黄河上游以及注入黄河的支流浩门河、湟水、隆务河、大夏河、洮河, 另有白龙江上游、安曲河、然科河、察曲河、金川河以及岷江上游、大渡河上游等。这些流域包括今青海大部、甘南、阿坝地区。我们理解,《安多政教史》的作者所列举的这些河流域就是指安多藏区。是故藏彝走廊北部地区即指安多藏区除青海藏区之外的甘南和阿坝地区。两地在信仰习惯、语言、服饰、习俗等文化因素方面具有共同的地域性, 故本书将两地视作同一地理区域, 统称为藏彝走廊北部地区。

二 藏彝走廊北部地区宗教文化的多样性

藏彝走廊北部地区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 总面积近十三万平方公里, 与我国福建省的面积接近。境内居住着汉、藏、回、羌等民族, 人口一百六十三万余。藏彝走廊北部地区有丰富的宗教文化资源, 有道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苯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以及民间信仰等信仰形态存在, 各种宗教处于共生共存的多元状态。

苯教是藏族固有的本土宗教。据记载, 大约在吐蕃第九代赞普布德贡甲时期 (约公元 2 世纪, 东汉时期), 苯教就已经在藏

^① 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著, 吴均、毛继祖、马世林译:《安多政教史》, 甘肃民族出版社, 1989年, 第5页。

彝走廊北部地区传播。公元6世纪，随着吐蕃王朝的扩张，苯教大量传入该地区。^①历史上，藏彝走廊北部地区苯教非常兴盛，曾经是苯教继象雄之后又一个大本营和复兴基地。全区有苯教寺院六十多座，著名的苯教寺院雍仲拉顶寺（金川之役后改名广法寺）、苟象寺、阿西象藏寺等均坐落于这一地区。特别是在嘉绒十八土司辖区，苯教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著名的苯教大师季念美喜饶坚赞（rje mnyam med shes rab rgyal mtshan）就诞生于嘉绒促侵地方（今阿坝金川县）。藏传佛教宁玛派与苯教在教义法术方面有不少相似或相同的地方，如二者教义中都有九乘之说等。在藏传佛教传入之前，苯教已在藏彝走廊北部地区广泛传播并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而藏传佛教宁玛派所具有的浓郁的苯教文化气息也为其在藏彝走廊北部地区的传播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道教也是藏彝走廊北部地区重要的信仰形态之一。据记载，大约在隋唐时期，今岷江沿岸已有道教传播。^②早期道教之一的五斗米道，其创教、传教的地域与藏彝走廊北部地区毗邻，是故道教在该地区的传播历史久远。藏彝走廊北部地区现存道教寺观有松潘黄龙寺、汶川水磨黄龙寺、茂县下兰庄老君庙、小金营盘街观音阁等。其中松潘黄龙寺最为著名，大约建于明代。黄龙寺依山而建，飞檐斗拱，雕梁画栋，富丽堂皇。有前、中、后三寺，殿阁相望，各距五里。传说黄龙寺为黄龙真人修道之处，黄龙真人在此修道成仙。还有传说认为，黄龙助大禹导江开道，有

① 《史略》编辑委员会编：《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藏传佛教史略》，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34页。

② 燕松柏、雀丹著：《阿坝地区宗教史要》，成都地图出版社，1993年，第66页。

功于人民，便建黄龙寺以示纪念。水磨黄龙寺建于明万历年间，起初规模较小，民国时扩建，占地三十亩。寺内建有祖师、社稷、观音、玉皇、圣母等殿。该寺由全真道主持。小金营盘街观音阁，也称观音庙，建于清光绪二年（1879），有宫观一座，占地面积 645 平方米。历史上曾经香火兴盛。^①

伊斯兰教传入藏彝走廊北部地区大约在唐末五代。随着丝绸之路贸易的发达，位于藏彝走廊北部地区的松州（今松潘县）成为当时的军事重镇和贸易集散地，波斯、阿拉伯、回鹘商人往来于此，他们在此地经商生活、繁衍生息，成为居住在藏彝走廊北部地区最早的“回回”民族。^②元代时，忽必烈南征，松州是其进军路线之一，色目人、回鹘人以及其他回回人进入藏彝走廊北部地区的松潘、阿坝、杂古脑、汶川、茂县等地。进入松潘的回民在县城东山麓建东山清真寺，这是藏彝走廊北部地区最早的清真寺。明代时，不但大批回族茶马商人进入该地区，而且随征西将军沐英出征的一部分回族将士在甘南临潭一带落户。清乾隆年间，金川之役后，乾隆皇帝下令在两金川一带修建城隍庙和清真寺。松潘、临潭、九寨沟、金川、小金、夏河、汶川、茂县、阿坝、若尔盖等地在历史上均建有清真寺。

另外基督教、羌族释比信仰、民间信仰等多种信仰形态亦存在于藏彝走廊北部地区，各种宗教和谐共存。多元的宗教文化也使得藏彝走廊北部地区成为宗教文化研究者的理想之地。

^①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阿坝州志》，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2494页。

^② 同上，第391页。

三 藏彝走廊北部地区藏传佛教文化的典型意义

首先，藏彝走廊北部地区藏传佛教文化的典型意义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藏彝走廊北部地区地处青藏高原向成都平原的过渡带上，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藏彝走廊北部地区“东进内地，西通卫藏，南下康区，北出河西”的区位优势，是中原和巴蜀地区通往西域及青藏高原腹心地带的重要交通孔道。在藏彝走廊北部地区的白龙江上游和岷江上游发现有大量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的遗存，^①证明早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甘青毗邻的河湟地区与白龙江上游和岷江上游一带存在着一条两地古代居民相互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交通线路。从春秋战国开始的羌人南迁，藏彝走廊北部地区是主要迁徙路线之一。南北朝时期，因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段受阻，丝绸之路河南道成为沟通东晋南朝与西域之间的重要通道。河南道从益州（四川成都）出发，沿岷江而上经茂县、松潘至甘南迭部、临潭、青海同仁、贵德，抵青海湖附近的吐谷浑伏俟城，接丝绸之路青海道前往西域。藏彝走廊北部地区正是丝绸之路河南道主要的过境地区。

藏彝走廊北部地区还是历史上“茶马互市”的主要集散地和川甘青藏茶马古道的主要过境地。从唐宋时期一直到明代，汉藏茶马互市的市場主要在西北一带，所以西山道（丝绸之路河南道在灌县、汶川、茂汶、松潘一带入出于西山，故被称为“西山

^① 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组：《四川理县汶川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65年第12期；陈良伟著：《丝绸之路河南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0页。

道”，唐朝与吐蕃征战也多取此道。)为茶马贸易的主要孔道。位于藏彝走廊北部地区的松州，是川、甘、青毗邻地区主要的交通枢纽，自古以来即为茶马贸易的主要集散地，有“川北门户”、“边陲重镇”之称。

藏彝走廊北部地区周边浓厚的佛教文化氛围也影响到佛法在该地区的传播。与藏彝走廊北部地区毗邻的巴蜀地区，在历史上是我国佛教文化相对发达的地区之一。早在汉末晋初，佛教就已传入巴蜀地区。东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巴蜀地区成为南朝中央朝廷通往西域等地的必经之地，西域僧人和汉地僧人通过著名的丝绸之路河南道频繁往来于此，促进了这一地区佛教的发展。据《高僧传》记载，有数十位西域及河西高僧经行河南道前往巴蜀、荆楚、建康等地弘传佛法。如昙摩蜜多、罽良耶舍、释玄畅、释慧览等。^①在河南道沿线还出土了大量的佛教造像等，如成都万佛寺佛教造像、^②茂汶南齐永明元年(483)叠溪佛教造像等。^③

与藏彝走廊北部地区接壤的河湟地区是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发祥地之一。当年朗达玛灭佛法时，被尊称为“三贤哲”的藏饶赛、约格琼、玛释迦牟尼三位大德逃至朵麦(甘青川毗邻藏区)。青海宗喀德康(今青海循化县一带)人喇钦·贡巴饶色拜三位为师并随他们出家。贡巴饶色是藏传佛教“后弘期”非常著名的人物，他出家以后，修习佛法、兴建寺庙、广收门徒，为佛法在西

① (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中华书局，第120页、第128页、第314页、第418页。

② 冯汉骥：《成都万佛寺石刻造像》，《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9期。

③ 袁曙光：《四川茂汶南齐永明造像碑及有关问题》，《文物》1992年第2期。

藏再度弘传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后来自西藏的卢梅·楚臣喜饶等人，依喇钦学戒。卢梅等回藏后，建立道场，普传戒律，使佛教的余烬从下路又重新复兴起来，此乃藏传佛教史所称之“下路弘法”。公元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在甘青毗邻的地区兴起唃廝囉政权。唃廝囉系吐蕃赞普之后裔，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宗哥（青海平安县）僧人李立遵、邈川（青海乐都县）首领温逋奇将其劫持到廓州（青海化隆县），后摆脱此二人控制的局面亲政，并迁都青唐城（今西宁），实行“联宋抗夏”政策，使唃廝囉成为这一地区强大的地方封建政权。今藏彝走廊北部地区的部分地区在唃廝囉政权的势力范围之内。据记载，甘南夏河县甘加乡的斯柔古城就是唃廝囉时期建造的，同时也是唃廝囉的发迹之地。^① 唃廝囉保持着吐蕃的文化传统，崇尚佛教。从上述可以看出，藏彝走廊北部地区周边浓厚的佛教文化氛围，客观上影响着藏传佛教在这一地区的传播。

其次，藏彝走廊北部地区藏传佛教文化的典型意义表现在藏传佛教格鲁派在这一地区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所呈现的不同于其他藏族地区的特性。我们知道，公元1409年，在阐化王扎巴坚赞的资助下，宗喀巴在拉萨大昭寺举行了规模空前的祈愿大法会，之后在拉萨东北建立甘丹寺，并以此为道场，招徒弘法，创立了格鲁派。格鲁派以其组织严密、僧人严守戒律、学经修习制度完备而受到广大藏族群众的衷心拥戴和信仰，并迅速在整个藏区传播，成为藏传佛教中形成最晚但却发展最快、势力最大、影响最深的教派，从而取代其他派别成为藏传佛教的主导派别。公

^① 政协甘南州委员会文史资料文员会编：《甘南文史资料》第五辑《甘南简史》（专辑），1986年，第70页。

元 15 世纪初藏传佛教格鲁派传入藏彝走廊北部地区，后经过无数高僧大德的弘扬，藏彝走廊北部地区成为除西藏以外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最为集中、发展最快的地区。藏彝走廊北部地区的格鲁派寺院拉卜楞寺是我国著名的佛教寺院之一。它与西藏拉萨的甘丹寺、色拉寺、哲蚌寺，日喀则的扎西伦布寺以及青海塔尔寺并称为我国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宗主寺，创建于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拉卜楞寺的建寺历史虽不很长，但经过历代嘉木样大师的不断扩充和完善，拉卜楞寺发展迅速，为藏传佛教其他寺院所不及，并赢得了卫藏尼哇（即第二西藏）之称，是继青海塔尔寺后，在西藏以外的藏族地区形成的又一佛教中心和文化重地。拉卜楞寺在藏传佛教学术研究、教育以及藏书等方面也在整个藏区首屈一指。拉卜楞寺以闻思、医药、时轮、喜金刚、上续部及下续部六大学院为主，其僧人学经制度在全蒙藏地区的寺院中最为健全。拉卜楞寺现有藏经卷约六万余册，为全国现有佛教寺院中藏经最丰富者。这些经书分为全集、哲学、密宗、医药、声明、历史、宗教、传记、工巧、历算、诗歌等十七类；拉卜楞寺在其发展过程中，人才济济，学者辈出，如一世嘉木样活佛、二世嘉木样活佛、三世贡唐仓·丹贝仲美活佛等均为享誉藏区的著名佛学大师。其中二世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所著的《安多政教史》是作者耗费了十二年心血，遍游安多藏区后写成的，是一部论述安多藏传佛教史的专著。它对于安多藏区主要寺院的历史、佛教各派的主要人物都进行了详细的记载，是研究安多藏区佛教史的重要参考资料。本书的不少研究资料也来自于《安多政教史》。

藏传佛教格鲁派在藏彝走廊北部地区发展的典型性还表现在

卓尼禅定寺刊刻的卓尼版《甘珠尔》、《丹珠尔》大藏经。卓尼版大藏经是我国藏文大藏经几种版本中质量最好的一种，名闻国内外。卓尼版《甘珠尔》大藏经是清康熙六十年（1721）由卓尼第十一代土司莫索贡保（汉名杨汝松）主持刊刻的。卓尼版《丹珠尔》由卓尼第十四代土司丹松次仁（汉名杨声）主持下，于清乾隆十八年（1753）开始到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竣工付印，历时二十年。

卓尼版大藏经集北京、拉萨、德格、纳塘版大藏经之大成，内容丰富全面，讹误极少，以设计精美，印刷清晰著称。美国地理学家乔治·洛克在1929年美国国际地理杂志上发表《生活在卓尼喇嘛寺》一文说：“卓尼版《大藏经》，雕刻精确，文字秀丽，历历在目，内容准确无误，独具风格，在藏文《大藏经》诸版中可称善本之一。”^① 这些都在显示着藏传佛教格鲁派在藏彝走廊北部地区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有别于其他藏区的特殊性。

再次，藏彝走廊北部地区藏传佛教文化的典型意义还表现在藏传佛教觉囊派在该地区的弘传以及觉囊派教义有别于藏传佛教其他派别的独特性。觉囊派在藏传佛教各派中是相对比较特殊的教派。觉囊派倡导“他空见”。创始人是域摩·弥觉多吉（yu mo mi bskyod rdo rje，约11世纪中叶时人）。“他空见”认为，世间万物都有其真实体性，这个真实体性是绝对的、永恒不变的，任何事物都包含在这个本体之中，因此不能认为事物本身是“性空”的，只是由于人们在认识上增加了一些“虚妄分别”的成分，才使得人们无法认识事物的真实体性，而只能认识到一些

^① 政协卓尼县委员会文史资料文工会编：《卓尼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1984年，第80页。

虚妄的表面的东西。因此“性空”只能说是“他空”，而不能说是“自空”。觉囊派的这种说法是和藏传佛教其他派别，特别是和格鲁派的观点相对立的。

17世纪格鲁派得势之后，五世达赖喇嘛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迫使觉囊派改宗，觉囊派从此在西藏湮灭无闻。但在藏彝走廊北部地区的壤塘、阿坝、马尔康等地保留了下来，而且影响颇大。笃补巴·喜饶坚赞的弟子嘉绒人仲·噶宇巴，于公元1397年（一说为1425年）在阿坝壤塘地方的一座苯教寺院的遗址上创建了吉祥壤塘大寺，即中壤塘三大寺之一的曲尔基寺（chos rje，意为法王。1550年，明世宗朱厚熜册封二世曲尔基寺活佛嘉哇僧格为“大善法王”，故后世将该寺称为曲尔基寺）。并以此为道场，弘扬觉囊派教法。觉囊派也由此开始在藏彝走廊北部地区大规模弘传。明永乐十六年（1418）明成祖朱棣敕封仲·噶宇巴为“弘教禅师”。之后，中壤塘三大寺的另外两座寺院——泽布基寺（tshe bcu）和藏哇寺（gtsang ba）也相继建立。到清乾隆年间，中壤塘三大寺发展成为觉囊派在整个藏区的中心，达到鼎盛时期。觉囊派以中壤塘三大寺为中心，向周边辐射发展，在藏彝走廊北部地区地区的壤塘、阿坝、马尔康等地，乃至青海果洛一带发展出众多子寺。

四 与本书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

本书对藏彝走廊北部地区藏传佛教寺院研究的视角以历史上藏传佛教在该地区的传播发展以及藏传佛教寺院的创建、寺院地域分布及特征，活佛系统及活佛籍贯的地域分布与特征，藏彝走

廊北部地区藏传佛教文化区的划分等为主要内容，亦即以寺院为中心，探讨历史时期藏传佛教在藏彝走廊北部地区的传播途径、地理分布、区域特征以及历史时期藏传佛教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等。而学术界从佛教地理的角度对藏彝走廊北部地区藏传佛教寺院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即便如此，还是有不少的论著或多或少涉及到本选题的内容。首先是佛教地理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梁启超的《佛教之初输入》、《佛教与西域》、《又佛教与西域》、《中国印度之交通》（见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四章之《汉代佛法地理上之分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中华书局，1962年版）等著作。这些论著可视为佛教地理研究的开山之作。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大陆及港台学者开始涉足佛教地理的研究，主要有辛德勇的《唐高僧籍贯及驻锡地分布》（《唐史论丛》第4辑，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长安城寺院的分布与隋唐时期的佛教》（《文史知识》1992年第6期）；香港严耕望的《唐代佛教之地理分布》（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六册《中国佛教史论集（二）》，台湾大乘文化出版社，1977年版）、《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台湾颜尚文的《后汉三国西晋时代佛教寺院之分布》（台湾《国立师范大学历史系学报》第13卷，1985年）；朱士光的《试论中国佛教与历史地理研究之关系》（张岂之、韩金科主编：《首届国际法门寺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张弓的《唐代佛寺群系的形成及其布局特点》（《文物》1993年10期）；张伟然的《湖南隋唐时期佛教的地理分布》（《佛学研究》1995年

第6期)、《湖北晋唐时期佛教地理》(《湖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李映辉的《唐代佛教地理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介永强的《西北佛教历史文化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朱普选的《青海藏传佛教历史文化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王开队的《康区藏传佛教历史地理研究》(暨南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等。以上这些佛教地理的研究成果虽然与藏彝走廊北部地区藏传佛教几无关涉,但对本书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可资参考和借鉴的理论和方法,尤其是后面三部研究著作与本书所研究地区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对本书在方法论方面可资借鉴。

其次是藏传佛教方面的研究成果。与本书相关的论著主要集中在政教史和教派史的研究方面,主要有:著名佛学家吕澂的《西藏佛学原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太虚法师的《西藏佛教略记》(上海佛学书局,1931年版)、妙舟法师的《蒙藏佛教史》(上海佛学书局,1935年版)、王森的《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王辅仁编著的《西藏佛教史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丁汉儒、唐景福的《藏传佛教源流及社会影响》(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班班多杰的《藏传佛教思想史纲》(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2年版)、宿白的《西藏佛教寺院考古》(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牙含章的《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和《班禅额尔德尼传》(华文出版社,2000年版)、李安宅的《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年版)、措如·次朗的《藏传佛教噶举派史略》(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赛仓·

罗桑华丹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史略》(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2年版)等。上述研究成果虽与本书关涉不多, 但为我们研究藏彝走廊北部地区藏传佛教历史地理奠定了学术基础。

再次, 藏传佛教寺院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主要有: 段玉明的《中国寺庙文化论》(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9年版)、蒲文成主编的《甘青藏传佛教寺院》(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0年版)、苗滋庶等编的《拉卜楞寺概况》(甘肃民族出版社, 1987年版)、冉光荣的《中国藏传佛教寺院》(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4年版)、索代编著的《拉卜楞寺佛教文化》(甘肃民族出版社, 1991年版)、燕松柏、雀丹的《阿坝地区宗教史要》(成都地图出版社, 1993年版)、陈履生编著的《西藏寺庙》(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5年版)、曹自强等编著的《西藏的寺庙和僧侣》(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5年版)、熊文彬的《中世纪藏传佛教艺术——白居寺壁画艺术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6年版)、杨辉麟的《西藏佛教寺庙》(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等。这些著作从不同角度对藏传佛教寺院做了介绍和分析。特别是扎扎的《拉卜楞寺活佛世系》(甘肃民族出版社, 2000年)、《嘉木样呼图克图世系》(甘肃民族出版社, 1998年)、《佛教文化圣地拉卜楞寺》(甘肃民族出版社, 2011年)、《拉卜楞寺的社会政教关系——拉卜楞寺发展策略研究》(青海民族出版社, 2002年)等是拉卜楞寺研究方面的力作, 对拉卜楞寺的创建、教区的拓展、活佛世系均有深入研究。还有觉乃·洛桑丹珠、冰角·婆帕次仁的《安多古刹禅定寺》、丹曲的《卓尼藏传佛教历史文化》(甘肃民族出版社, 2007年版)两部著作对卓尼藏传佛教历史文化以及卓尼禅定寺发展都有独到的见解。另外, 杨贵明的《藏传佛教高

僧传略》(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唐景福的《中国藏传佛教名僧录》(甘肃民族出版社, 1991年版)等对藏传佛教高僧进行了详细的介绍。除此, 在藏文史料中还有许多藏传佛教高僧大德的撰著, 如《第吴宗教源流》、《布顿佛教史》、《红史》、《青史》、《白史》、《西藏王统记》、《西藏王臣记》、《汉藏史集》、《如意宝树史》、《土观宗派源流》、《安多政教史》以及大量的有关藏传佛教的寺院志, 高僧传记, 甘南、阿坝州政协文史资料, 宗教志等内容的资料, 都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与本书相关的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有: 如法国藏学家石泰安的《甘青藏走廊古部落》(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2年版)、《西藏的文明》(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9年版), 意大利藏学家图齐的《西藏中世纪史》(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 1980年内部资料)、《西藏考古》(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 意大利藏学家伯戴克的《十八世纪前期的中原和西藏》(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元代西藏史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等。这些研究成果对藏彝走廊北部地区的藏传佛教地理研究略有涉及。日本人对藏区历史地理研究以佐藤长、山口瑞凤为代表。

五 本书研究的思路、内容与方法

自公元8世纪开始藏传佛教已在此地区传播。明清以降, 藏传佛教在藏彝走廊北部地区的传播和发展更是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寺院丛林遍地, 高僧大德辈出, 形成了藏传佛教在西藏之外的又一个中心。众所周知, 寺院既是藏族文化的中心, 同时又是藏族民众表达宗教信仰的场所, 而藏族文化的核心即是藏传佛

教文化，故从寺院入手研究该地区藏传佛教文化发生、发展以及演变的情况将会起到窥斑见豹的效果。同时，以寺院为中心探讨藏彝走廊北部地区藏传佛教历史地理的变迁也是本书所要重点讨论的部分。宗教与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任何一种宗教的传播都离不开一定的地域空间，而宗教一旦传播开来，就会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就会反作用于地理环境，并成为地理环境的组成部分。现当代藏彝走廊北部地区的藏传佛教文化现象大都植根于历史时期，如果不了解历史时期藏传佛教文化在该地区的时空变迁情况，也就很难准确把握现当代藏传佛教文化在藏彝走廊北部地区的地理分布及其地域特征。探讨历史时期藏传佛教在藏彝走廊北部地区传播途径、景观分布、区域特征以及历史时期藏传佛教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等是主要研究内容。基于这些思路，本书分为六章来具体进行探讨：

第一章主要探讨藏传佛教各派的形成以及在藏彝走廊北部地区的传播情况；第二章是对藏彝走廊北部地区藏传佛教寺院创建的历史脉络进行梳理并分析历史上藏彝走廊北部地区寺院创建所呈现的特征；第三章主要论述藏传佛教传入藏彝走廊北部地区的地理、文化背景，以及元代以前藏彝走廊北部地区藏传佛教寺院的地域分布与特征；第四章分析明清及民国时期藏传佛教在藏彝走廊北部地区发展的背景、藏传佛教寺院的地域分布及特征；第五章主要讨论藏彝走廊北部地区藏传佛教寺院的主要活佛系统以及活佛籍贯的地域分布与特征；第六章重点论述藏彝走廊北部地区藏传佛教学术中心的地域特征以及佛教文化区的格局与变迁。

本书以历史文献的收集与整理、历史文献与宗教文献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作为首要的研究方法；其次，在研究过程中将文献资

料与实地考察相结合；再次，除运用历史学、地理学、宗教学的研究方法之外，还借鉴了民族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力求对历史时期藏传佛教在藏彝走廊北部地区的传播途径、地理分布、区域特征以及历史时期藏传佛教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等进行深入探讨。